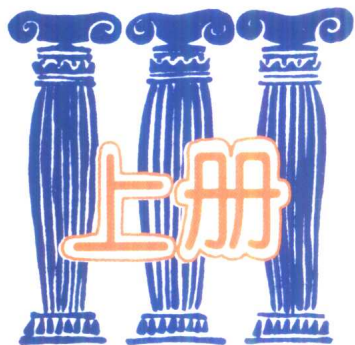


全譯本

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

〔日〕中村元 著

林太 馬小鶴 譯



淑馨出版社

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

〈全譯本〉

上 冊

〔日〕中村元 著 林太 馬小鶴 譯

淑馨出版社

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中村元著；林太．馬小

鶴譯． -- 初版． -- 臺北市：淑馨，民88

面： 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531-632-0（上冊：平裝）． -- ISBN
957-531-633-9（下冊：平裝）

1. 哲學 - 東方 2. 民族性 - 亞洲

113

87017116

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全譯本〉} 上 冊

作 者：中村元

譯 者：林太．馬小鶴

出 版 者：淑馨出版社

發 行 人：陸又雄

編 輯：尤淑芬

地 址：台北市安和路2段65號2樓（日光大廈）

電 話：27039867・27006285・27080290

郵 撥：0534577～5 淑馨出版社

印 刷：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登 記 證：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613號

出 版：1999年（民國88年）2月初版

1999年（民國88年）2月一刷

定 價：380元

序

由於西方與亞洲各國的命運越來越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中村元教授的力作《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英譯修訂版的問世，對於尋求了解亞洲各複雜社會的學者乃至門外漢，不管是大受歡迎的福音。本書將是夏威夷大學東西方中心首屈一指的出版物，這評價一定是恰如其分的，因為中村元先生的著作涉及了發展東西方之間進一步相互了解的兩大關鍵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所謂“東方方式”與“西方方式”的富有意義的鑑別問題。人們怎樣才能界定它們的本質屬性呢？怎樣才能進行系統比較，從而引導出醒目而生動的基本差異點和相似點呢？在歐洲人“發現”亞洲至今的四個半世紀中，儘管文化聯繫加強了，但歐洲人和亞洲人對於對方的了解實在太少。錯誤的對立與呆板的比較持續了一代又一代；認識很難達到，理解更是談何容易，人們無可規避地落入陳辭濫調的概括俗套。近期以來，有些陳辭濫調被改頭換面，套上一些新的術語，致使大量上當受騙的讀者相信，他們正在被賦予新的魔力鑰匙，以便能啟開通向“東方思想”、“東方邏輯”的諸大門。但是這些鑰匙打開的只是庸庸俗套和碌碌幻想的夢幻世界。

中村元教授一掃這些陳腐習氣，他以嚴謹而客觀的態度，著手分析亞洲四個民族各具特色的思維模式，他通過研究四個民族的邏輯和文化產品，從而把它們的思維模式揭示出來。在這類分析中，他既不談論籠統的“東方思想”，也不述及不加區分的“西方思想”。他寧願在確實了解東方諸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和歷史的基礎上，逐一論述印度人、中國人、西藏人和日本人。當他在談論“西方”時，他也充分意識到構成西方文明的多層性的傳統。在我看來，他似乎表明了一種理解水平，一種只有當我們超越了“東方”、“西方”鐵板

一塊的古代神話時才能達到的理解水平。

作者在這研究領域中闡述的第二個重大問題，同樣牽涉到亞洲民族與西方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的必要性。中村元先生是這樣提示的，在今日世界中，顯然沒有一個民族能將自身與世界範圍的思想運動隔絕開，並且相信，每一地區的人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生活賴以依存的價值觀都趨向於不斷變更。然而每一民族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對起著作作用的各種各樣的影響力進行選擇，然後是攝取和修正他們所選擇的那些因素。那麼，是什麼力量在制約這一過程呢？它怎樣使得混合文化——有些因素是本土的和獨特的，有些因素顯然是從一次或另一次世界範圍的運動中獲得的——顯現的呢？中村元先生認為，在佛教的悠久歷史中存有這一過程的某些線索，佛教始於印度並在那兒不斷演化，然後它逐一侵入中亞、東亞、東南亞的歷史社會中。印度人、中國人、西藏人和日本人持續不斷地從演進著的佛教傳統中，選擇和攝取一些因素。各民族選擇和攝取的方法揭示了某些長盛不衰和獨具特色的思維模式、某些至關重要的價值觀及心態活動，而這些思維模式、價值取向又制約著借鑑的範圍和攝取佛教思想的過程。當人們恰如其分地理解了這些民族在佛教方面的經歷時，這轉而又幫助解釋了這些民族之間的不同點以及他們今日對西方文化的差異甚大的反響。這就是中村元先生責成自己在本書中探討的重大課題。

這項宏大的研究涉及四個文明，四種語言文字系統，2,500年的歷史，以及大量的分析問題，這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們對這位作者的注目。他是怎樣的一位人物，他在什麼環境下孕育和撰寫了這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中村元先生在1947年完成了他的日文初版，是時他才30多歲。在這部著作的早期階段，它的某些部分發展成為由伊藤吉之助教授領頭的一個更龐大的語言和文字研究工程的組成部分，但本書的涉及範圍及研究方法顯然都是中村元先生本人的。中村元先生193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1943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57年他因四卷本的早期吠檀多哲學史而獲得日本研究院的“帝國獎”。自1954年以來，他成為東京大學印度哲學和佛教哲學教

授。

中村元教授在東京大學專門從事對印度和佛教的研究，這一專攻領域也需要他涉獵中國、西藏、日本的文化研究以及對佛教傳統的研究。在這研究過程中，他獲得了撰寫本著必不可少的廣博的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然而，從中村元先生學涯的一開始起，他的求知興趣就促使他超越了印度學和佛教學的傳統界域。他成為日本的一名印度近代化研究的大家，他的著作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印度古代史研究、原始佛教研究、印度哲學傳統研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吠檀多哲學的研究。他的多篇文章論述了近代印度的一些活著的傳統，他還寫有關於近代日本宗教的性質的專著，以及大量有關語言、文化和東西方文化關係的著書。

1945年一場特大災難降臨日本，它引出了一個知識和精神的大動盪時期。日本知識分子向自身提出一系列有關他們的國家和文化、有關一個新日本在新世界秩序中的潛能等基本問題。這種重新估價和規劃的偉大努力之一，就是進行比較研究。人們希望，這種研究將給日本人帶來有關文化和社會、神話和價值的一種全新觀念。正如中村元先生在本著日文版的導言中所說，他立志通過多種文化的比較研究，以此進行國民性自覺的新努力。他在印度和佛教研究方面的素養，引導他去考察四種社會（包括他設身處地的日本社會），而這些社會根據各自接受佛教的經歷，以不同方式受到佛教的影響。其他知識的影響也對他使用的研究方法有著制約作用。

長期以來，西方哲學一直是中村元先生的主要興趣之一，他的這些興趣對本著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有著規制作用。中村元先生最先接觸的是諸如羅素(Russell)、杜威(Dewey)等英美哲學家的思想。在這一階段，他也廣泛閱覽了狄烏森(Deussen)、凱澤林(Keyserling)和叔本華(Schopenhauer)等學者的著作。在閱讀了須藤新吉教授的《邏輯學》後，中村元教授便開展對德國邏輯學家的研究。他長期以來沉迷於溫德爾班德(Wunderband)的研究哲學史的“問題探討法”。

像世界上的許多學者一樣，中村元先生也深受絕對主義哲學普

遍崩潰的影響。他被迫探詢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是諸如“這類觀點與某絕對主義體系是一致的嗎？”而是“某些社會中的某些人持有這類觀點，它是怎樣造成的呢？”人們的舉止怎麼會受這些觀點影響的呢？”“在什麼樣的變化條件下，人們將改變這些觀點？”在系統闡述這類問題時，中村元先生受到馬克思(Marx)、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以及和辻哲郎教授的影響——和辻哲郎的著作《風土》(Climate)探討了環境與思維的關係。這樣在本著中，中村元先生把哲學思想的研究用於進行一種遠遠超出了傳統哲學範圍的探詢。這種探詢尋求分析四個亞洲民族的思想模式或“思維方法”，這四個民族在各具特色和緩慢演化的過程中，對各自的經驗進行選擇和歸類，彼此爭論，並且作出富有價值的判斷或實踐決定。要進行這樣的一種分析，中村元先生勢必涉及整個現象領域，此領域大概可分類為社會——歷史學、心理學和語言學。

於是，進行思維方法比較研究的設計就從我們已注意到的這位知識分子的志趣中發展出來了。本著的研究共分四部分，每一部分的討論都是遵依共同的設計而展開的。首先是對語言和邏輯的討論，以及對每一民族習慣採用的判斷和推理的特殊方法進行討論。然後作者在每一部分中都以哲學著作、文學、個體及群體的行爲來證明這些模式。佛教在每一部分都充當“化學沉澱劑”，以便離析出那些根深蒂固和執著不變的本土的思維方法。

中村元先生意識到，各種清晰的邏輯闡述和哲學闡述是他注目的這四個社會中少部分受教育的精英層的特殊財產。但是，如果我予以的解釋尚屬正確，那麼中村元先生認為，精英層的哲學性闡述實際是對人們在社會共同生活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問題的更具普遍性和抽象性的譯解。反過來說，民間俗語、諺語、日常思維就是對哲學家理論的一種下層或趨向下層的譯解。爲了尋求證據，說明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以及佛教思想和佛教價值是怎樣進入這四個社會的進程中的，中村元先生已撒下了一張廣闊的網。他盡心搜查了民間文學、大眾信仰的祈禱詞和文字材料、諺語集、日常生活的描述，以及只要有可能，他就運用外國觀察者的闡述，因爲他們全新的眼

光常常能錄下從本社會批評家眼中逃逸的那些特徵。這樣，他最終不僅向我們顯示每一社會的精英層是怎樣把握佛教思想和信仰問題，而且向我們顯示這一進程是怎樣影響整個社會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的。

英譯修訂版在許多方面反映了中村元先生自1947年以來的學術思想的發展。當他在撰寫日文第一版時，日本剛剛開始從戰爭和軍事管制的歲月中顯露出來。自那以後，中村元先生廣泛閱讀了哲學、人類學和語言學諸領域的新著作。1951—1952年間，他訪問了斯坦福大學，他的這部著作是該校人文學院研究會長達一年的注目焦點。1962—1963年，中村元先生在東西方中心再次與研究會的學者們討論了他的見解。作者根據最近15年來的經驗，修改了本書的某些部分、一些有爭論的段落以及大量的文獻資料。

把英譯修訂版顯示給西方讀者，這正是一樁快事。學者乃至門外漢在這部書中都能發現中村元先生對一系列的重大問題有著何等豐富的洞察力。我認為，讀者最終將讚揚作者是一位在知識領域中不斷求得進取的不知疲倦的探索者；他當然也是一位學者，他在研究方面的精湛技巧與他對新知的冷酷無情的追求是並駕齊驅的。

阿瑟·弗雷德里克·賴特

耶魯大學

英譯版序

中村元教授的《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是1962—1963年間東西方中心各次討論會的熱點，與會者一致認為現存的英譯版（已脫銷）理應由更可讀和更新的修訂本來替代。由於東西方中心一些造詣頗深的學者以及先進課目研究院譯作研究部門(Department of Research Translations of Institute of Advanced Project)的幫助，並且通過與原著作者及夏威夷大學諸位同仁、尤其是與肯尼思·K·意那達(Kenneth K. Inada)教授的密切合作，我的編輯方針才定為提供一部更精確印刷、同時又結合諸多新特點的改訂版。著名學者阿瑟·F·賴特(Athur F. Wright)教授執筆的新“序”便是這新特點之一，因為他對於中村元先生歷來的研究十分熟悉。賴特教授和查爾斯·A·莫爾(Charles A. Moore)教授一直鼓勵我們譯出這新的版本。

著名的漢學家P.德米維爾(P. Demiéville)最近評論了中村元博士的著作，他說：“如果沒有注釋中充分標明的那些文獻為依託，書中任何陳述和假設都是難以闡明的。……它是印度、中國、西藏和日本諸民族的‘思維方法’特性的比較研究，並伴有一個針對整個東亞而言的‘導言’和‘結論’……作者以文化現象作為廣泛探討的手段，主要通過語言學，同時也涉獵心理學、社會學、美學和邏輯學。……作者決無賣弄學問的玄虛，而是以一種生動的、有時是幽默的調子來抓住你的興趣。……日本部分在篇幅上幾乎占全書的一半，它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因為它構成為一種民族的自我批評，審慎而不失尖銳，你難以想像那是出自一位日本人之手。……作者對所謂‘東方精神’——被認為對於整個東亞是共通的——神話進行了正面而切中要害的駁斥。……西方思想具有普遍性的論斷也沒有逃脫遭同樣駁斥的命運。”

中村元教授對日文原版和英譯第一版進行了很大幅度的修訂，補充了大量的新材料。其主要變動大致為：導言部分增加了，有關印度、中國、西藏、日本의思想和文化的近期研究成果被利用了，增加了有關西藏研究的若干章節，重新組織了論述日本的一些章節，編製了索引（英譯第一版沒有編索引）。作者對文獻注釋也進行了修訂，包含了更多的近期研究成果，翻譯了更多的文獻的標題，更多討論了文獻作者和各思想流派領導人的生平時代。

中村元教授的思想頗具寬度和適應性。他甚至允容修改一些基本思想和解釋，這便是有力佐證。例如在新修訂的英譯版中更多強調了社會——文化傳統和地理環境影響，而不是過分強調先天特徵及民族或人種的特點。

我十分感激作者擴大了我在思想史方面的興趣範圍，因為我從作者關於東方民族的深奧思想和文化的詳盡論著中，學到了很多東西。能與中村元教授這樣的著名日本學者合作，實是我的榮幸，也是一次頗有教益的經歷。

腓力普·P·溫納

夏威夷大學東西方中心

紐約市立大學

中村元先生的致謝

在《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新英譯本出版之際，作者欣然命筆，借助寥寥數語，對辛勤工作並使英譯版最後完成的諸位學者，表示誠摯謝意。

本著由來已久。早在1945—1946年間，已故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伊藤吉之助受日本教務省的委託，意圖推進不同民族間的思維方法的比較研究。他邀請我協作。我接受了他的提議，對這一領域進行了必要的研究，並向教務省呈送了多份報告。

自那以後，我繼續深化此項研究。我首先決定應採用何種研究程序和研究方式，以便我的研究成果能夠體現出來。我當然認識到，如果在方法論上沒有清晰認識，我將不能取得預期的科學準確性。因此，爲了求得系統性研究，我憑藉分析各民族典型的判斷形式和推理形式，從而離析出每一民族的思維方法的特性。在我看來，思維方法的特性在這些表達形式中能最清楚地揭示出來。我避免大而全的討論。然而，我有時運用上述方法離析出來的一些特性，來考察能夠反映各民族思維方法和思維過程的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闡釋佛教和因明學從印度傳導至中國、西藏和日本的各具區別的方式（意即各民族在接受一種普遍性的宗教和邏輯學時，是怎樣把它們融入當地文化特色的），這構成了我研究的中心點。所以我使用一些同樣的方法來分別考察每一民族的思維傾向（關於日本人的思維方法，我不得不涉及對儒學的攝取與修正問題。然而，我對這一研究領域實在力所不及，所以只能偶爾論之）。東西方思維方法的對照和比較是與本著切切相關的課題，它構成整個研究的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我在闡釋印度人的思維方法時，特別有意識地呈示了古代西方一些民族的思維方法，以此作爲對照。雖然古代印度人和古代西方人在人種上和語言上有著一定聯繫，但在他們各

自的思維方法中存在著許多不同點。我認為，澄清這些差異是一項十分重要的科學工作。我並不是對他們在文化哲學理論中的差異進行研究，而是對展示在語言和文化現象中的各自的思維方法特性，進行專門的和建設性的研究。

1950年，當“洛克菲勒基金會”(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主席查爾斯·B·法斯(Charles B. Fahs)訪問東京時，他接受了鶴見俊輔教授的提議，敦促對本著(1948—1949年的日文版)的若干章進行嘗試性的英譯。“洛克菲勒基金會”與東京“思維科學委員會”達成了翻譯協議。於是，英譯本著的編輯委員會成立了，成員們翻譯了“導言”及“日本人的思維方法”各章。

1951年9月，我作為哲學訪問教授應邀去斯坦福大學。為討論已英譯部分的書稿的內容，該學院成立了一個研究會，成員有約翰·戴維·高亨(John David Goheen)教授(哲學)、阿瑟·F·賴特(Arthur F. Wright)教授(歷史)、池信敬教授(政治學)、伯納德·約瑟夫·西格爾(Bernard Joseph Siegel)教授(人類學)、伯特·阿爾弗雷德·吉洛(Bert Alfred Gerow)教授(人類學)、戴維·謝菲爾德·尼維遜(David Shepherd Nivison)教授(哲學)、托馬斯·加利略·史密斯(Thomas Carlyle Smith)教授(歷史)和雷蒙德·K·沃特斯(Raymond K. Waters)教授(日本語)。該研究會每隔一星期討論一次，每次會議都發表若干報告，對英譯本的某些方面進行了評論和修正。

1952年7月我離開美國，尼維遜教授和沃特斯教授繼續編輯本著的英譯稿，英文選譯本就這樣完成了。1952年，我在逗留倫敦期間翻譯了“中國人的思維方法”的若干章節，後來由賴特教授編輯，在科羅拉多州(Colorado)阿斯彭(Aspen)的“中國思想學會”上發表。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日本國內委員會決定本著為第一批由日本學者英譯的哲學著作。為此目的，一個編輯委員會成立了，幫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日本國內委員會的秘書處安排翻譯事宜。1958年8月21日，我受邀協作此項工程。整部書的

翻譯工作在1959年6月完成，1960年由“聯合國教育科學和文化組織”日本國內委員會出版，書名為“The 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s”。

現在我們正準備呈獻給讀者一部不同的新英譯本，它主要依據東京春秋社1961—1962年的改訂版日文本編譯的。

1962年8月至1963年1月，當我訪問夏威夷大學東西方中心時，那兒一些資歷頗深的學者，如牛津大學榮譽教授霍默·H·達布斯(Homer H. Dubs)、紐約城市大學哲學系系主任腓力普·P·溫納(Philip P. Wiener)教授、印度索戈爾大學助教授達耶·克里希納(Daya Krishna)，都對本著產生了興趣，他們在查爾斯·A·莫爾(Charles A. Moore)教授的倡導下，形成了討論小組，定期會晤。他們的發言和批評對於本書英譯版的重新修訂是極有幫助的。

溫納教授作為《思想史雜誌》(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的常務編委，對於學術著作的編纂有著長期而豐富的經驗，他對於新英譯版的貢獻居功至偉。他奉獻出大量的寶貴時間，編輯本書，重新譯寫了它的絕大部分，對有關西方思想方面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消除了一些印刷錯誤，刪却了一些不甚連貫的段落。安妮·瑪古拉(Anne Magura)不辭辛苦地打出了溫納教授的全部改寫稿。

1963年4月溫納教授抵達日本，在訪日的二個月中，我們繼續就《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的改編本進行合作。肯尼思·意那達(Kenneth Inada)教授在收到溫納教授的修訂本後，閱讀了全部文稿。哥倫比亞大學的角田龍作(Ryusaku Tsunoda)教授是美國的日本語研究專家，他當時正好在東西方中心，不時給予本書十分有價值的幫助。當時也正好在東西方中心的學者沃特·馬留爾(Walter Maurer)，對印度部分提供了幫助。

我十分感激東西方中心主任亞歷山大·斯波爾(Alexander Spoehr)、東西方中心副主任愛德華·W·溫德納(Edward W. Weidner)，翻譯部主任米諾魯·西諾達(Minoru Shinoda)及哲學系系主任溫菲爾德·E·那格雷(Winfield E. Nagley)的盡可能的

周到安排，從而使得我們能夠完成這項工程。最後我將對耶魯大學的阿瑟·F·賴特教授表示誠摯謝意，他為新的英譯本撰寫了序言，這令我不勝榮幸。

中村元

1963年6月

目 錄

序 001

英譯版序 006

中村元先生的致謝 008

導言 001

東亞諸民族的思維方法 001

“思維方法”與其他術語 003

思維方法與語言 004

思維方法與邏輯 006

思維方法與文化現象 008

在接受外來文化的方式中反映出來的思維方法
009

研究東方諸民族思維方法的順序 010

各種文化現象和東亞諸民族的思維方法 011

東方思想與文化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021

思維方法的差異的認識根據與實在根據 031

第一篇

印度

第 一 章

序 049

第 二 章

對普遍性的重視 052

對抽象概念的偏重 052

予抽象概念以實體性 056

第 三 章

否定的性格 061

對否定表達的愛好 061

以否定來把握絕對者 063

第 四 章	對未知的憧憬 067
	無視個體與特殊體 072
	語言表現 072
	無視個體和特殊體 077
第 五 章	萬物一體觀 081
第 六 章	靜止的性格 088
	通過語言的靜止相來理解靜止的性格 088
	思維形態的靜止性 092
	時間觀念的缺乏 095
	好沉思的態度 099
	被動和忍從的行為態度 106
第 七 章	對人格的主體把握 106
	語言表現的對人格的主體把握 106
	哲學思想中啟示的對人格的主體把握 108
第 八 章	普遍的自我優於個別的自我 115
	語言所顯示的自我的無限擴展 115
	自他連續觀 117
	自我存在的自覺 121
	自我和他我不二的倫理 125
第 九 章	對普遍性的從屬 133
	語言中啟示的對普遍性的從屬 133
	行為主體的擴大 134
	對行為的普遍性規範的尊重 137
	領悟真理：信仰和理性主義 142
	有限的倫理體系的超越 144
	有生類的意識；印度關於人的概念 150
	印度人思維的保守性 153
	確定規範的學問的發展 155

第 十 章

與客觀自然界的疏遠 164

缺乏關於客觀自然界的秩序的觀念 164

無視自然規律的空想性 171

採取極端的傾向 176

對神話與詩的喜好 177

缺乏歷史意識 180

真理觀 182

自然科學的不發達 183

第 十 一 章

印度人思維的內向性 192

內心反省科學的發達 192

第 十 二 章

印度人思維的形而上學性 197

印度人思維的宗教性 197

超越現世的傾向 202

超越諸神的思維傾向 206

第 十 三 章

寬容與和解的精神 211

第二篇

中國

第 十 四 章

序 221

第 十 五 章

對具體知覺的重視 226

文字的具體形象性 226

概念的具體表達 227

依賴知覺表象進行闡釋 230

圖示說明 232

第 十 六 章

抽象思維的不發達 239

缺乏普遍性意識 239

語言及思維的非邏輯性 241

缺乏對普遍性法則的理解 245